

一个世界, 两种制度: 中国的观点值得一听

威廉·佩顿, 2019年11月
【英文稿译文】

1971年, 在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令20多年之后, 两国开始通过一场乒乓球赛来缓和关系。“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是中国对这场球赛的宗旨, 准备在比赛中让美方赢几局。本着同样的友好精神, 美国同意到中国来, 即便会输掉这场中国国球的比赛。比赛期间到处是欢声笑语。随后, 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 中美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 并进行了长达40年的建设性往来。



Jono Sandlands: The Art of Ping Pong

而当今的世界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不断指责中国的许多行为, 主要包括不公平贸易、阻止国际公司进入其市场、窃取知识产权、掠夺性的国际贷款、香港缺乏民主、新疆种族迫害以及非法占领南海岛屿等。

对许多西方人而言, 这些的确是问题。通过批评中国, 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捍卫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信仰。这种言辞正变得日益尖锐, 中国被指责在香港已经搞砸了“一国两制”, 然而这似乎更像是某些西方人无法忍受“一个世界, 两种制度”。

在“乒乓外交”时期, 出于对苏联势力影响双方共同利益的担忧, 中美两国领导人远见卓识, 跨越了巨大的鸿沟, 使两国关系开始解冻。

当时，中美相差甚远。一个是共产主义国家，拥有全球 22%的人口，却只创造了全球 5%的产值。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仅以全球 5%的人口竟创造了全球产值的 35%，这与 1820 年中国占全球产值三分之一的情况大致相当，当时中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

如今，中国政府依然是社会主义的一党体制，但它正在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其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份额已回升到 16%，或 14 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市价计算）21 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二。

当今，中美有巨额的贸易往来，伴有许多高度整合的供应链。中国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就派出维和部队而言，中国是迄今为止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

这两种制度的趋同，为东西方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国际问题，如战争、贫困和环境污染等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提供了机会。然而，一些西方领导人和媒体，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却蓄意煽动对中国的敌意，向那些本对中国存在模糊看法的国内民众示以强硬的言辞。

在古希腊，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变得过于强大之前，用剑和铁头盔先发制人是很有诱惑力的，即“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在当今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的公开冲突是具有破坏性的，很难看出益处何在。

美国及盟友显然对全球力量的新平衡感到不安，因为在这种新平衡过程中，他们将不再毫无挑战地来主宰世界。现任美国政府将美国的很多经济弊病归咎于中国，并得到反对党民主党的默认。尽管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美国现总统立誓确保中国的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

中国让 8 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人类史无前例的成就，但也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环境大规模被污染，法治尚未充分发挥作用，腐败现象严重，尽管多年来政府一直对其严厉打击，但仍层出不穷。医疗保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农民工的孩子无法在其父母工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入学。

中国之梦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很多其它问题，以实现小康社会。中国乐于学习其它国家的做法，经常邀请外国专家就某个特定问题提供建议。如今，中国本身在电子商务或电子支付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有很多东西值得其它国家学习。

这种相互交流和共同进步的机会正在被肆意抛弃。中国和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因很多西方政客试图取悦选民，带有偏见的媒体试图取悦他们的读者，而蓄意恶化。同时，与过去的泰然沉默不同，今天的中国政府会很清楚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然而，北美、澳大利亚和其它地方的读者只能持续得到缺乏实质内容的、并不能反映中国观点的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

首先，让我们从贸易谈起，美国指责中国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很清楚美国贸易赤字由来已久，自从 1975 年以来，就是一种常态，而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出口。美国的贸易赤字就是简单的数学，即消费超过生产，导致进口超过出口，每年通过高额的公众借贷和低储蓄来支撑。在这种贸易逆差情况下，美元贬值或将有助于增加出口。然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其币值高估于应有价值。

美国和其它西方公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极地向中国工厂出口需要加工的产品，以降低成本。值得赞扬的是，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不到 40 年的时间里，成为全球一半以上制成品的生产国，这可谓是一场真正的“大跃进”。

如今，中国人从美国购买的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可以很容易地从其它地方购买，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由于需要复杂的供应链，却很难从其它地方采购。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事与愿违地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自 2018 年 1 月以来，这种贸易逆差在短短的 20 个月里就增加了 20%。

而中国在 2018 年的出口增长 10%，达到 2.48 万亿美元，进口增长 16%，达到 2.14 万亿美元。这 3400 亿美元的净盈余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大致相当于中国对美国的盈余。不过，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为 500 亿美元，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为 500 亿美元，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为 700 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成品，对美国的服务业逆差 400 亿美元。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贸易已经开始重新繁荣起来，回到了几个世纪前大致相当的水平。

中国出境旅游不包括在贸易数据中，但旅游支出已近 3000 亿美元，占世界旅游支出的五分之一以上。因此，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大致平衡。

准入中国市场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企业在与外国投资方合资合作经营时确实要求转让技术，久而久之常伴随中方企业获取合作方技术的结果。这是企业行为。这种情况直到近几年才得以改变。谷歌等美国互联网公司拒绝遵守中国的某些安全法规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这也同时帮助了中国本土企业如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成为巨头。美国最近对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的禁令也是如出一辙。两国都在竞争中寻求庇护，且都以安全关切为借口。

很少有人意识到许多美国和西方企业在中国有多么成功。今天中国有超过 4800 家肯德基分店、3300 家星巴克咖啡店和 1450 家必胜客分店。沃尔玛表示，它正在经历中国电子商务的“爆炸式增长”。在中国 2.5 亿辆乘用车中，超过 55% 是西方品牌，以大众和丰田为首，还有大量的奔驰、奥迪、雪佛兰和几乎所有其他品牌。世界银行最近将中国的合同执行力评为世界第五，将中国的商业环境评为世界第 31 位，高于去年的第 46 位。

知识产权问题：一些中国公司已经或继续窃取知识产权，特别是美国的知识产权。仅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有 2 万多名毕业生曾在硅谷工作，毫无疑问，其中一些人离开硅谷时，他们的数字文件袋里装着视为窃取的知识产权。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态度已经转变。拉夫、赫尔姆斯和埃伯哈特的一项研究发现，在 2006 年至 2011 年间，外国公司在中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盗窃案件中赢得了 70% 的胜诉。2017 年，在 2 万起外国投诉中，外国公司赢得了 80% 的胜诉，法院随后下达了 98% 的强制令来执行裁决。中国有望在 2019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专利申请国，因此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利益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重要。

债务陷阱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将在 30 年内向 68 个国家投资 3 万亿美元，用于建设基础设施、扩大贸易和改善通讯。投资中既有赞助，也有贷款，中国企业的确通常会承建基础设施，也会把没有技能的中国劳动力带进失业率高的国家。尽管存在这些缺陷，“一带一路”仍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为数十个国家互惠，增加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包括非洲大部分地区。而且，较贫穷国家享有额外的福利，比如免费的中国卫星数据，以及使用这些数据所需的设备和援助。

美国及其盟友对该计划的反应是刻薄的，嘲笑它是一个邪恶计划，让有关国家落入债务陷阱。事实上，中国是第一个免除很多国家债务的国家。在 2007 年，中国对约 25 个国家的对华债务被一笔勾销。大多数国家目前欠中国的债务远远少于欠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

香港问题：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香港的示威活动也同样直言不讳。香港年轻人被历史发展的潮流所裹挟，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感受。美国现已经通过了旨在影响中国香港内部事务的法律。如果将此角色颠倒过来，这种对另一个国家的干涉将是西方不可容忍的。再试想一下，

如果中国，也向加泰罗尼亚选民希望的那样，就民选领导人最近因脱离西班牙举行公投而被判处100年监禁一事，发表类似言论，那些正在干预香港事务的国家会有什么反应？

香港是在英国的炮口下被占领的，被伦敦统治了一个半世纪，毫无民主可言。英国不允许香港臣民有合法抗议的权利。这项权利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才恢复。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年轻国家的公民很难理解这样的历史屈辱在中国人民集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新疆问题：多数西方国家批评中国在处理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上采取的严厉做法，将数十万本国公民送往教培中心。他们不试图了解对方做法的初衷，就对中国横加指责。

在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接壤的新疆偏远地区，中国一直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一场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2014年，新疆分裂分子在一个省会级城市昆明的火车站用长刀袭击乘客，造成130人死亡或受伤，举国震惊。手无寸铁的警察在喀什慢跑时在街上被枪杀。游客在新疆高速公路上被随意拦下并杀害。这样的事件数以千计，受害者亦数以千计。问题极其严重。

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方式让世界更多地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另一个误判是，曾认为大规模投资和开发新疆会受到欢迎。相反，中国的主要民族—汉族人口的大量涌入，使一些维吾尔人感觉被排除，受到歧视，尤其是在就业方面。这无疑助长了极端主义的蔓延。

中国政府承认这些教培中心主要面向穆斯林群体的维吾尔人，尤其是来自较贫困地区、受教育程度低、最容易被极端化的人群。中国强调被“拘留者”主要学习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党的文件、汉语和职业技能。其目的是预防恐怖主义，消除极端思想，并在招聘就业方面采取积极保护措施。

中方的这种做法与西方哲学具有深刻矛盾。西方认为公民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少在他们自己的政府管辖下是这样。中国政府认为恢复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这需要清除数千名被认为受激进化思想影响的人员，并将他们关押数月。的确，目前极端分子的袭击已经制止，新疆旅游业已经恢复。这种严厉的方式是否真的会结束长期的恐怖暴力，被强制在教培中心的维吾尔人的自由是否会很快恢复，尚有待观察。

南海问题：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其它北约领导人，对中国主张在南海岛屿的主权并驻军不断进行抱怨。诚然，中国的九段线环圈海域乍看起来有点贪婪。

但是，中国已签署了管理开发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部美国自身拒绝批准的法律。当菲律宾向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申诉中国占领南沙群岛(Spratly Islands)，中国提前发出了必要的通知，表明拒绝参与仲裁，并引用了与菲律宾已经签署的条约，在条约中，两国一致同意双边解决边界争端。中方还表示，这是主权问题，不是开发权问题，因而不受该法院管辖。由于中国缺席，该法庭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此外，台湾方面也拒绝承认仲裁法院的裁决。现在，中国提出与菲律宾分享这些岛屿的开发权。

二战结束时，中国被西方战胜国排除在与日本签署的协议之外，日本放弃了对其在南海占领的许多岛屿的主权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一直曾是海上强国，比如900年前在其他国家甚至还没有大航海船的时候，中国就在南海捕鲸了。我们可以把中国坚持的南海九段线环圈海域与美英两国对世界上诸多岛屿的主权主张比较一下，英国在阿根廷海岸外有福克兰群岛(Falklands)，美国在南太平洋有十多个岛屿，中国的立场不难理解了。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南海的军事形势。想象一下，当越来越多的美国军舰、核潜艇和战机驶近中国海岸时，中国会有什么感受？它不能再接受他们的贸易、石油和进口食品主要通过的海洋仍在美国控制之下。目前，岛上的设施是具有防御性的措施。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用有核武器能力的军舰到佛罗里达州或威尔士海岸附近巡航，或者用喷气式战斗机进入美国或英国领空测试它们的雷达，西方大国将如何反应？尽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西方主要军事大国仍在南海附近挑衅性地派遣军舰，并声称，他们这样做的权利正受到侵犯。

如今，有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愈加严重。例如，美国媒体报道了特朗普总统决定将对对中国商品征收新关税的时间从 2019 年 10 月 1 日推迟到 15 日的决定，因为其总统说中国刘副总理的办公室曾打电话要求这么做。数小时后，中国外交部否认曾发生过此类通话，但许多新闻媒体仍在报道此事，而丝毫不提及中国对于此事的澄清。

西方民众显然接受这种片面报道。纳诺斯调查和研究公司(Nanos)最近针对加拿大人对北京的看法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0%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政府有负面或一定程度负面的印象，这一比例近年来一直在上升。

在美国，皮尤调查公司(Pew)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较去年上升 13%。同时此公司发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比较积极。

几十年来，面对批评，中国媒体一直坚忍面对。2009 年，世界媒体报道称，在气候变化问题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COP15)期间的一个特别会议上，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会面，中国只派出了一名中层官员，当时中国被指责破坏了该协议。几个月后，事情原因才澄清，原来特设小组是在最后一刻才邀请中国。

中国礼貌地避免让任何人难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现在对攻击会做出坚决而迅速的回应，但许多西方媒体仍不情愿报道中国的回应。

看到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媒体，以及中国国内的中文新闻报道，我觉得很具有讽刺的事实是，受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媒体对西方观点的报道通常比其它媒体更加属实公正。

今天，中国的观众也经常看到有关中国日益增强军事力量的新闻报道，自豪地展示了正是存在争议的南海岛屿的设施，让中国人确信他们的国家现在能够做好自我防卫。

当前的美国政府致力于与中国对抗，对其采取边缘政策，并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华情绪，如此一来，未来的美国政府，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没有这种缓和，目前的冲突很可能继续升级。

优秀的谈判者首先试图理解对方的观点，然后逐步建立信任。相反，目前西方有些领导正在挑剔性地审查中国的观点，并从根基上削弱信任。如今，本以耐心著称的中国也越来越以愤然反击回应。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其它政府不敢与美国政府公开作对。美国的盟友，尤其是“G6”，有责任大声疾呼。尽管他们可能对中国的崛起有自己的关切和担忧，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赞成冲突升级，然而，他们忽略了自己应该大声疾呼、发出理性的声音这一庄严职责。不久前，意大利至少找到了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勇气，而英国对美国坚持禁止华为的做法却仍犹豫不决。这很难扭转对华关系的消极趋势，防止冲突升级。

中国也需要尽力重新找到令人钦佩的政治智慧，妥善处理分歧，不要因为某支球队经理对香港的个人评论而断然地取消全国篮球协会(NBC,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比赛的转播。这种做法只会让人们更加相信中国政府试图对国外的言论进行审查。

1971 年，乒乓球成为破冰者，几个月后，基辛格国务卿悄悄访问了北京。毛泽东主席随后邀请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这是 20 世纪外交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重新营造了相互倾听和对话的全球气氛，开创了一个极大造福全世界的新时代。

重视新闻自由视为多党民主制的优点之一。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意见并鼓励辩论。现在，是他们再次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了。是时候让“一个世界，两种制度”发挥作用啦。

加拿大人 Dr William M. Paton (威廉·佩顿 博士) 曾是联合国在刚果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索马里的国别代表；全球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国别方案主任；国际发展法律组织副总干事；联合国移民机构负责非洲和中东事务的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国际灾害研究项目主任。他现居住于北京。欢迎您将意见发送到 billpaton@qq.com。